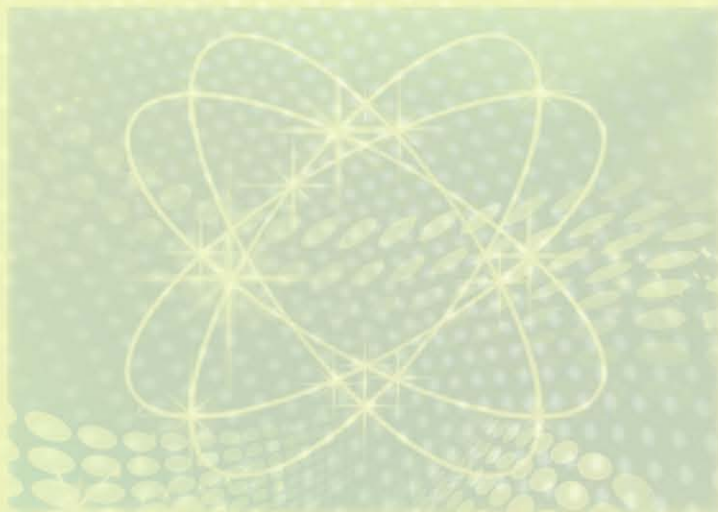


西域史林

(第一辑)

盖金伟 主编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史林(第一辑)/盖金伟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518 - 0410 - 3

I. ①西… II. ①盖… III. ①西域—历史—文集
IV. ①K928.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031338 号

西域史林(第一辑)

盖金伟 主 编

出 版 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18 - 0410 - 3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sqebs.com>



卷首语

《西域史林》是新疆师范大学校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术辑刊。

新疆古称西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域在人类发展,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保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自 20 世纪初叶以来,随着西域考古、探险及大量遗存的发现和释读,西域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朵奇葩。

随着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新一轮的新疆建设开发已经全面展开,围绕着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个中心,新疆的各项事业进入到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丰富多彩的新疆历史文化研究也逐步形成欣欣向荣的美好局面,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

历经 30 余年的不懈努力,新疆师范大学专门史研究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侯灿教授、王有德教授、彭琪教

授、钟国发教授、孟宪实教授、王智娟教授等专家学者的开拓和引领下,在西域考古、吐鲁番文书、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形成了西域史(古代)、新疆史(近现代)两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目前,专门史重点学科依托学院民族学博士点民族史方向,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点,形成了以盖金伟教授、施新荣教授、刘学堂教授、阿利亚教授为核心的研究、教学团队,并确立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研究领域,力争以突出区位特色为抓手,进一步促进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西域史林》作为新疆师范大学专门史重点学科的一个学术平台,是展示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提升研究水平的学术阵地。我们将以科学严谨、开放多元为宗旨,广泛汲取国内外学术营养,注重基础,突出特色,使之成为国内外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之一,也为促进新疆各民族团结,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疆师范大学专门史重点学科

2012年7月



目 录

001 / 卷首语

古代史研究

- | | |
|-------------------------------------|--------------|
| 001 / 楼兰研究析疑——楼兰问题驳难之二 | 侯 灿 |
| 012 / 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起源与传播——再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 | 刘学堂 |
| 040 / 新疆考古发现的青铜时代铜器和草原铜鍱 | 王 博 |
| 050 / 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 | 李树辉 |
| 081 / 献俘礼与“北庭大捷”质疑 | 盖金伟 |
| 089 / 兴复哈密与明正德朝宫廷朋党之争 | 施新荣 |
| 100 / 清代新疆自然灾害研究综述 | 阿利亚·艾尼瓦尔 |
| 112 / 青金石古今中外名称考 |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

目 录

近现代史研究

- | | |
|----------------------------------|---------|
| 122 / 构建与实证——评《浩罕国与西域政治》 | 王智娟 |
| 129 / 新疆吉木萨尔千佛洞考述 | 王鹏辉 |
| 140 / “识宝回回”与中国珠宝业 | 王 平 |
| 153 / 建省前新疆文化教育的三元共存与新疆社会 | 何 荣 |
| 167 / 清代末年新疆吐鲁番地区乡约研究——以社会互动理论为例 | 赵丽君 |
| 174 / 民国时期中苏文化协会与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 | 王继平 |
| 182 / 浅析塔合曼乡被称为“乌孜别克人”的家族 | 米丽古丽·艾山 |

青年论坛

- | | |
|-------------------------------------|-----|
| 186 / 浅谈“奥斯曼主义”思潮变异及衰亡的原因 | 苏闻宇 |
| 198 / 《史记·大宛列传》与大宛之役 | 马晓娟 |
| 204 /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西域马政 | 唐玉华 |
| 215 / 17 世纪前半叶的叶尔羌汗国——以东部政权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 白海提 |
| 235 / 准噶尔与吉尔吉斯关系述略 | 曹 盟 |
| 242 / 清乾隆年间西域之“玛哈沁” | 王启明 |
| 250 / 新疆高校非定向免费师范生政策实施初期风险及对策研究 | 王谢平 |

260 / 后记

楼兰研究析疑

——楼兰问题驳难之二

侯 灿

【摘要】本文根据斯文赫定及斯坦因等人的考古发掘,指出楼兰古城就是西汉元凤四年前楼兰王国的都城,这里是两汉王朝的屯戍重地。至曹魏西晋时期,这里是西域长史的治所与驻地。

【关键词】楼兰 罗布泊 汉代考古

由于楼兰在我国古代史籍中缺乏完整的记载,其遗址、城址的发现发掘又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证实,因而对其研究的人们提出了诸多不解之谜。经笔者爬疏,一个世纪期间有一些所谓的谜,经过认真仔细地做些工作是完全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有一些谜是在传闻过程中造成的讹误,也是可以澄清的,当然还有一些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到证实。现就前面两种情况作辨析。

一 楼兰的发现

楼兰的发现和罗布泊之争与斯文赫定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斯文赫定一生中三次到过罗布泊:1896年、1900~1901年、1934年。1934年的一次是为南京国民政府调查公路线,与本题关系不甚密切,略而不赘。斯文赫定第一次到达罗布泊是受到他的老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启示和指点,为了弄清俄国普尔热瓦尔斯基认定的喀拉库顺是否是中国历史上的罗布泊的问题。他于1896年的4月来到罗布地区罗布人聚居的阿不旦村,在罗布人的引导下,对塔里木河的下游和孔雀河的河湖作了调查。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谓的罗布泊,是在近期100多年内形成的新湖泊,真正的罗布泊是在



喀拉库顺之北,当时尚未完全干涸,是《史记》记载的“盐水”,《汉书》中记载的蒲昌海。斯文赫定的考察成果,受到了以李希霍芬为代表的德国学者的高度肯定,但却遭到了俄国学界的反对。此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已经去世,科兹洛夫视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导师,李希霍芬也年迈古稀,双方争执是他们的这两位学生为代表。1897年10月15日斯文赫定应邀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进行讲演,受到了与会者的责难。斯文赫定已意识到俄国学者是以多次考察成果作为反击依据的,而自己仅凭20多天的考察,是不足以折服对方的。于是他决意在即将开始的新的一次中亚探险考察中,为罗布泊的考察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经费,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寻求答案。

1899年12月7日斯文赫定把他的探险大本营帐篷架设到了塔里木河下游的英吉库尔,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于1900年3月5日离开英吉库尔,他的队伍中有哥萨克兵齐诺夫、驼夫发苏拉与两个罗布人艾尔迪克和库鲁等人,3月23日他们到达了阿尔特米希布拉克小绿洲,开始了向南贯穿罗布荒漠的艰险行程。3月28日齐诺夫和艾尔迪克在奇异的地沟中为骆驼寻找最佳路线在前头跑,下午三点钟他们突然停立在一座小土岗上,原来他们发现了几间木屋废墟,经赫定测量三所房屋的木梁还在原来的位置,但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房屋。3月29日他们在走了一程约20公里之后,来到了一块洼地,洼地里还长着几株活着的怪柳,赫定想这里的潜水一定不会很深,由于他们所带的冰水所剩不多,于是决定在此掘井取水。这时才发现他们所带的唯一的一把铁铲不见了。艾尔迪克直爽地承认是他忘记在昨日的破房子里了。他立刻请求回去寻找。艾尔迪克休息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半夜动身骑着斯文赫定的坐骑,人和马都饮足了水出发了。两个小时后,突然一阵东北暴风刮了起来,天昏地暗,直到第二天早上也不见艾尔迪克的身影,因为缺水他们不能久等,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行。他们在越过一条矮沙丘后,在一块荒脊的地方准备驻营,大家意外地看见了艾尔迪克牵着马带着铁铲站在他们面前。斯文赫定看到艾尔迪克带回的钱币、雕花木板等,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这样写道“我那时简直有点头晕了。我十分情愿回到那里去。不,这是愚蠢的行动!我们只有一两天的水了。这样做我的整个旅行计划是要被推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在明年的冬天一定要回到沙漠里来,艾尔迪克答应把我引到他发现木刻板的地方。他之忘掉了铁铲,这只是一种运气,不然我将永远回不到古城,永不能有这样大规模的发现,给中亚的上古史投下新的意想不到的光辉。”^{〔1〕}

〔1〕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315页。



可是斯文赫定并没有等到第二年冬天,他在藏北高原漫游了4个多月后,于1900年底由阿斯丁山向东到达400公里外的阿兰巴伦乌拉,再转而向北穿过戈壁沙漠至阿尔特米希布拉克,然后再向南去寻找艾尔迪克因丢失铁铲而发现的废墟。1901年2月24日他们在暴风沙的袭击下,好不容易顺着风势到达了阿尔特米希布拉克。赫定在这里稍作休整,便率领人员向南行进。据赫定记述,艾尔迪克并没有参加这次考察。3月3日他打发所有的人去寻找去年3月29日艾尔迪克发现的房屋废墟。他在《中亚与西藏》中记叙道:“直到黄昏的时候他们陆续地返回了,其中有两个人发现了另一座高塔(泥塔),在其周围有几座房屋废墟。他们还从那里带回来了一些谷物,一条生了锈的索链……等发现物作为证据。他们建议我应该将那里作为这次考察的大本营。因此,第二天(3月4日)一早我们便来到了新的泥塔下,在塔的西南侧扎营,这样做是为了在暴风来临时得到塔的庇护⁽¹⁾。”斯文赫定从3月4日至10日一直宿营在这里,营地编号为CLIX(即159),经他测量营地所在经度 $89^{\circ}50'53''$,纬度 $40^{\circ}31'34''$ 。同时他把高塔附近的房屋废墟,从A至Q——编上了号,绘制成平面图。经笔者核对,此处大废墟,便是斯坦因1906年编号的LA⁽²⁾。斯文赫定继续写道“3月6日……我给夏格都尔描述了我们去年驻营的地方……在夏格都尔的指引下,我们从3月3日停留的泥塔向正南走……我们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最后我们到达了去年宿营的那个地方,根据我们去年留下的几堆灰烬,很容易地辨认出了。再往前走一英里,我们便找到了艾尔迪克发现的那个地方,很明显是一座佛教寺院。他留在疏松土地上的马蹄足印仍清晰可辨。”⁽³⁾此处佛教寺院,1906年12月斯坦因再次考察,编号为LB. II。

3月8日斯文赫定令其随从人员对CLIX营地附近的所有房屋废墟进行大肆挖掘,并向他们许诺“谁发现了有文字的东西,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文字,便给以很多赏金。”然而那些被丰厚酬劳激起了热情的人们,将营地周围的废墟挖了个遍,他们就像黑人那样不知辛苦地工作着”。在一些木制房屋中仔细搜寻,毫无所获。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座土块建的房屋中,这座房屋就像一个有三间马栏的马厩,穆拉在右边一间最高的马栏中挖出了一张被压皱了的残纸片,其上写着十分清楚的手写体汉字,获得了奖金。赫

(1) 斯文赫定:《古罗布地区的废墟·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city of Lassa),卷2第6章,伦敦,1903年,第111、112页。

(2) 侯灿:《艾尔迪克发现古楼兰城辨误》,《新疆大学学报》,1998,(1)。

(3) 斯文赫定:《古罗布地区的废墟·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city of Lassa),卷2第6章,伦敦,1903年,第124、125页。



定自豪地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墙壁之内的每一粒沙子都被过滤了一遍,就像用筛子筛过了那样。在地表两英尺以下,即在这些垃圾的下面有 200 多张纸片和 42 块木片显露出来,其上都有文字^{〔1〕}。

赫定返回故乡后,将这些写有文字的物品请德国威斯巴登的汉学家哈瑞·卡尔·希姆莱进行解读,希姆莱把解读的初步成果写信告诉了赫定,希姆莱说这些材料时属 3 世纪中期和 4 世纪初期之间;国家的名称叫楼兰。1902 年希姆莱正式发表了《斯文赫定在古罗布淖尔(泊)旁边的发掘》一文,文中指出:“楼兰这个名称在木片上和碎纸片中都出现过,无疑,这是这些信件上的地址名称,或是指信件保存地点的名称。其中一块信件的木片是要送往敦煌和酒泉(肃州)的。同样一块木片的底部写着泰始六年三月十五日,这是楼兰收到信的日期。”^{〔2〕}从此,楼兰之名被揭示出来。楼兰的名称和斯文赫定的名字被欧洲知识界广泛传颂。哈瑞·卡尔·希姆莱不久去世,考释工作继由莱比锡大学的奥古斯特·孔拉德完成,孔拉德于 1920 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汉文文书与其他发现》一书。

由上所述 1900 年 3 月 28 日斯文赫定一行发现的三所木屋遗址,1900 年 3 月 29 日夜艾尔迪克回到旧驻地去寻找丢失的铁铲在暴风中发现的房屋废墟,与 1901 年 3 月 3 日斯文赫定雇用的两名劳工发现的高泥塔及其附近的废墟,是三处不同的地点,不同时间和不同人物发现的,但是我国有些研究人员和一些新闻媒体,把这三者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介绍和报道,实在是不应该的。

二 斯坦因改变了第一次对楼兰考察的看法

人们都这样说:在中亚腹地的探险考察中,开路先锋是斯文赫定,获考古成果之大成者是斯坦因。斯坦因于 1906 年和 1914 年手捧斯文赫定对楼兰探险测绘的地图,跟踪而至。这两次他都从若羌县的阿不旦村出发,在雇用的罗布人向导带领下进入罗布荒原。

〔1〕 斯文赫定:《古罗布地区的废墟·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city of Lassa),卷 2 第 6 章,伦敦,1903 年,第 132 页。

〔2〕 斯文赫定:《古罗布地区的废墟·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city of Lassa),卷 2 第 6 章,伦敦,1903 年,第 139—144 页。



1906年12月17日斯坦因第一次把他的探险帐篷安置在1901年3月4日斯文赫定编号为CLIX的高泥塔下的西南侧。斯坦因经过考察,认为这座高泥塔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佛塔⁽¹⁾。它有相当的高度,以后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斯坦因把这处废墟编号为LA,由于房屋甚多,再用大写罗马数字由I分编至XI号。斯坦因命令他雇用的30多名劳工,大肆挖掘,获得重要成果之一的便是已经编写刊布的汉文本简157枚,纸文书28号,怯卢文书45枚(件)。12月23日斯坦因结束了对LA的发掘,便把帐篷搬至距LA西北约8英里的一处废墟,他把这处废墟编号为LB,再就其房屋布局分编为I至III,经笔者查对LB II就是1900年3月29日晚斯文赫定雇用的向导艾尔迪克发现的寺院遗址。12月25日斯坦因又在东约一英里处寻找到了斯文赫定在1900年3月28日晚的旧驻地,斯坦因将其编号为LB. IV—V。12月28日斯坦因再向东南行,在距LB. II三英里多处寻找到了斯文赫定于1901年3月3日晚住宿的地方,他把这里编号为LB. VI。他在对LB考察期间,同时对这些遗址进行了大肆挖掘,出土了大量的泥塑浮雕残片,木雕佛像、佛塔、各种浮雕图案和青铜戒指、铜镜残片、铜箭头等以及丝、毛、棉织品等,还出土了汉文本简两枚、纸文书一枚,怯卢文纸文书7枚。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于1909年3月8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作了题为《中亚探险1906~1908》的讲演,这次讲演成文后登载在《地理杂志》第34卷1、3号上。文章中说“诸多的暗示证明了恰克里克(Charklik即若羌——笔者)小绿洲是古代中国朝圣者所说的楼兰和马可波罗所说的罗布的真正位置,我曾在这里开始为我长期探险罗布淖尔(泊)以北的废墟作准备,那些废墟是赫定博士在著名的1900年旅行中第一次发现的。”文中提到把恰克里克当作楼兰,而把斯文赫定发现的遗址称作为“罗布淖尔以北的废墟”。未能出席听取这个讲演的斯文赫定,后来阅读到了斯坦因的讲演文章,向协会致信,这封书信也被登载在《地理杂志》第34卷3号上,信中写道“从斯坦因博士的讲演中得知,他能够从我的地图中找到古楼兰遗址的消息令我很高兴。斯坦因博士在他的讲演中说,这些废墟不是楼兰,楼兰应该在更南的地方。我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因此,我不能够参加有关这个地方是不是楼

(1) 关于这座佛塔,斯坦因在《西域》第11章《楼兰遗址》中用了一节来着重分析论述。斯坦因说:“这是一座佛塔,而不是一座瞭望塔。这一点凡是接触过一些佛塔废墟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看上一眼,就立刻会辨认出来。”(牛津英文版,1921年,第389页)可是,在80多年后依然有人重复着斯文赫定的老调,把它作为军事区的烽火台(瞭望塔)。参见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讨论》,载《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一书,后来又收入《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兰的讨论。我之所以叫它为楼兰,是从威斯巴登的哈瑞·希姆莱那里得来的信息。哈瑞·希姆莱是负责设计印刷我带回的那些文书的,这些文书几乎都是汉文。”^{〔1〕}

1914年2月斯坦因又来到罗布荒原,他这次探险考察的范围比1906年12月的一次更为广泛,他把这一次连同上一次考察的各个遗址点,以英文字母从L到LT编了17个大号(其中缺N、O、P)。这次的主要收获有:发现了LA古城的城墙;发掘了LC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丝、毛、棉、麻织品;发现并发掘了LK古城堡遗址以及其他各个遗址;同时也获得了木简91枚,纸文书67号,怯卢文书10枚(件)。经过斯坦因这次全面考察,同时欧洲的语言学家对怯卢文书进行解读,发现了Kroraina一词,认为是楼兰的对音。因此,他改变了以前对LA古城的看法,他认为LA就是楼兰古城址,因此他在1916年以后发表的讲演、论著、地图以及1921年出版的《西域》(Serindia)、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两部大型科学著作中都用楼兰统一起来。可是,我国有的研究者直至90年代期间,仍然重复着斯坦因在1909年时的老调,把若羌硬说成是楼兰城址。

三 是楼兰 LA,还是海头 LK

1909年3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团的成员橘瑞超、野村荣三郎至新疆塔里木盆地“探险”。野村由轮台、库车西去喀什。橘瑞超由焉耆、库尔勒南下,穿过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汇合处,于3月下旬进入罗布荒原。在此期间他获得了李柏文书。以后他们两人由喀什去印度,野村负责把这次“探险”所获的主要物品运回日本,橘氏则随同大谷赴英国伦敦。在野村运回的物品中就有李柏文书。日本学者在研究这些文书时,野村传言:这些文书是在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的支流、名叫孔雀达里雅河岸的一片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以后,日本学术界的有关论著都持此种说法。但是,橘氏到伦敦后主动会了因中亚探险而已经闻名的斯坦因,并向他讨教“探险”经验。当时橘氏年仅19岁。在会见时,橘氏向斯坦因出示了李柏文书的照片。他们两人研究这些文书应出自LA。事后,斯坦因把这个认定写入了他的科学著作《西域》一书中,虽然斯坦因写得并不十分肯定,但却十分具体,他写道“根据这位年青的日本探险者在那一年秋天对我的口头说明,他似乎在

〔1〕 J eGeographicaJournalVol. XXXIV, No. 1,3, July ~ September, 1909. P25.



LA. II . IV 内的一座墙的土坯缝内发现的,土坯缝位于地面之上的一定高度。”^{〔1〕}于是西方人士研究李柏文书时都从斯坦因之说。1912 年橘氏由欧洲回到日本。他对 1915 年日本刊行的《西域考古图谱》和 1937 年刊行的《新西域记》中关于李柏文书出土地点采用野村说法也未提出异议。这样东方和西方学术界对李柏文书出土地点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1914 年正月我国学者王国维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所获的西域汉晋木简与橘瑞超所获的李柏文书时发现,李柏文书中有一件文书,在“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一语中,“此”字被圈去,旁边注上了“海头”二字;另一件文书则直接书写成“月二日来到海头”。以此他认定“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王氏之说提出后,不仅对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而且对楼兰古城是不是楼兰,也都成了问题。于是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论^{〔2〕}。日本学者森鹿三对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一直持有疑问。1959 年 5 月当文书出土五十周年纪念之际,他特地去会见了橘瑞超,询问了斯坦因《西域》所载此文书在 LA 发现的由来,橘氏说有当时出土文书地点的照片。森氏根据橘氏提供的照片,经过与斯坦因等的有关资料认真对照,判定这张照片恰恰是斯坦因 1914 年 2 月在罗布荒原“探险”时编号的 LA 城址。森氏的成果以《李柏文书的出土地》为题,发表在《龙谷史坛》第 45 期上。

80 年代初期随着楼兰研究热潮的再度兴起,我国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李柏文书出土于 LA 说,并且得到了日本学者配合,于是争论重新展开。笔者认为首先需对所谓的李柏文书从内涵上予以正确界定。根据《西域考古图谱》史料图版(1)~(8)(简称“西图史”)所载,可将橘氏拿走的文书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西图史(1)中的 4 枚木简;第二组是西图史(2)~(7)中的 2 件李柏文书及其相关的 39 件碎片;第三组是西图史(8)中的 4 枚纸文书。关于第一组,书法风格、运笔技巧都有其一致性,所书内容都是屯戍吏士日常生活及其治安等事,所书时间明确为西晋泰始五年,其官吏有赵辨。这些内容正可以与出土于 LA. II、LA. III、LA. V、LA. VI . II 的木简文书相适应。关于第三组,从其所书字迹、语意、人名看也与 LA. II 出土的残纸文书有联系。关于第二组,即真正意义上的

〔1〕 斯坦因:《西域》(Sindia),伦敦,1921. P377.

〔2〕 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第四部分和《李柏文书出土于 LK》,均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又拙著《跋片山章雄〈李柏文书出土地〉》,载《新疆文物》,1999 年第 2 期,《西域研究》同年第 3 期转载。



李柏文书,从其书写风格和内容看都与第一第二组不类,李柏所处时代属前凉张骏时期,自然与两组有别。从橘瑞超提供森鹿三 LK 遗址的照片来看,这一组应当出自 LK。但是大谷探险团的成员,大多是些年青僧人,他们既缺乏应有的考古学素养,又缺乏必要的历史地理知识,李柏文书究竟出自 LK 或是 LA,橘瑞超一辈子也未向学术界交代清楚,恐怕今后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四 楼兰国都在哪里

关于楼兰国都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比较分歧的意见,主要是对《汉书·西域传》中的《鄯善传》的记载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现不同认识。传云“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又云“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楼兰国与鄯善国,在西汉元凤四年(前 77)只是更名,并不存在迁都不迁都的问题,鄯善国的扞泥城,就是楼兰国的都城。扞泥城的具体地点在今若羌县城或其附近。持这种意见的学者除了认为《西域传》没有明确记载迁都外,他们还认为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城,出土遗物都是两汉以后之物,尤其是出土木简残纸文书记载的都是曹魏西晋时期军队屯垦戍守之事,因而他们认为楼兰城只是在两汉之际才发展起来的军事重镇,并不是西汉时期的楼兰国的都城^{〔1〕}。另一种意见认为楼兰国更名鄯善后,不仅国名更改,同时也迁了都,楼兰国的都城在今楼兰故城,鄯善国的都城才是扞泥城。《鄯善传》所说的“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是追述鄯善国的历史来源于楼兰国,并非指楼兰和鄯善的国都都在扞泥城。笔者坚持后一种意见。笔者认为虽然《鄯善传》没有明确记载迁都的事,但是《史记》和《汉书》记载楼兰与鄯善的道里远近及其交通位置则各有不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 126 年张骞第一次西通大宛后向汉武帝报告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这里记载的“临盐泽”当然是指楼兰的城邑,“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当然是指城邑附近的罗布泊至长安的距离。而《汉书·西域传》的《鄯善传》却云:鄯善国王治扞泥城,

〔1〕 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年;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收入《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此外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楼兰更名鄯善后,国都扞泥城仍在楼兰城。参见长泽和俊《楼兰王国》,角川书店,1963 年,又第三文明社,1976 年。



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并且只字未提及“临盐泽”。《史记·大宛列传》又载李广利两次伐大宛都是走盐水、楼兰而至宛城。第一次于太初元年(前104)宛国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于是天子大怒”。“天子已尝使浞野侯(赵破奴)攻楼兰”,“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以往伐宛”。第二次于太初二年(前103),“转车人徙相连属至敦煌”,“至仑头”,“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可是第一次说到的路线是盐水—楼兰—宛城,第二次的路线是敦煌—仑头—宛城。当伐大宛取得胜利后,《大宛列传》总结当时的情况云“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此置字疑有讹误,当在酒泉之后——笔者)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这里提到的路线仍然是敦煌—盐水—仑头—宛西诸外国。《汉书·西域传》记载的鄯善情况,除了追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楼兰国的史事外,还补充记载了更名迁都后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鄯善传》的结尾时说“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这“西通”二字如果从楼兰方位来看应是西南通。这“七百二十里”的里程如果从楼兰来计算则大大超过。不过这个记载正合乎班固《汉书·西域传》说到的西域南道起至鄯善。可是这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建立以后的事。

也许有人会问楼兰在更名迁都后,楼兰原来的都城又用作什么?笔者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认为,这里仍是两汉王朝屯兵戍守的重地。《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云“狂王复尚楚主解忧……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巨转谷,积居卢仑以讨之”。此事当发生在郑吉为都护的神爵三年(前59)之后、楚主解忧于甘露三年(前51)回京师之前。卑鞬侯井,孟康注曰“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居卢仑又称居卢訾仑,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先生在土垠发掘的西汉木简文书中多次出现有居卢訾仑。这条史料虽然未明确记载西汉当时进攻乌就屠的行军路线是要经过楼兰的,但是行进方向,肯定是要经过楼兰城的。另外土垠出土木简文书有一简记载云“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这枚木简记载了庚戌这一天发生在土垠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天还未放明时即平旦时,向西走失了官方文书;另一件是天放明时即日出时,三老到来,吃早饭即食(辰)时已回去了。黄文弼先生解释云“‘三老来坐’者,三老为乡官之名。”“此云三老来坐,则汉时乡村制度遍及西域矣”。笔者以为“遍及西域”倒未必,但此处的“三老来坐”者却暗示出了楼兰在更名南迁后,楼兰原来的地方是否被汉政府设置为一个乡级单位,这个乡级政权是由敦煌郡的某县来管辖倒是大有可能。如果笔



者推论不误,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汉书》的记述在更名鄯善国之后,对楼兰本地的活动为什么不予记载了。一般来讲古代史籍很少记述乡村政权的事。事实上,《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后期鄯善国的户口最盛时才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人,这也不及内地一个乡级政权管辖的数目。《汉书·食货志》云“乡万二千五百户也。”到了东汉时期,楼兰地方毫无疑问是有汉族吏士在此屯田戍守的。《后汉书·杨终传》记载:建初元年(76)大旱谷贵,杨终向汉章帝上疏:“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建议“悉罢边屯”。又《后汉书·班勇传》记载:元初六年(119)邓太后召班勇朝堂议事,勇上议曰“宜遣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疆鄯善于田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朝廷虽未完全采纳班勇建议,但于延光二年(123)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124)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班勇的这些对话和他出任西域长史后的实际行动,充分说明了楼兰在东汉经营西域上的地和作用。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楼兰城中没有发现两汉时期的木简文书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又不是一个问题。说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楼兰城中已经出土的文字资料中确实没有这些资料。说它不是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楼兰城中及其附近遗址所作的考古工作十分有限,虽然楼兰城被风掏蚀得很残破,但是考古工作并没有完,比如我们对楼兰城址的考古层位工作以及城址中后人对前人遗迹遗物的扰乱破坏等并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就以笔者1980年在斯坦因编号LA. IV. II的垃圾堆发掘为例,开的探方面积不过10平方米,就出土了60多枚简纸文书。就是在斯文赫定1901年挖掘过的三间房署官遗址,斯文赫定让他的劳工像过筛子一样把那些房子的积土筛过一遍,当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去再次考察时,又挖获了简纸文书30多枚,笔者于1980年在他们挖掘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清理,又清出了简纸文书各1枚。2000年3月26日至4月3日笔者第三次考察楼兰,与新疆考古所原所长王炳华先生同行。王炳华告诉笔者,新疆考古研究所于近年在楼兰东北LE城不远处又发现了两汉时期彩棺墓。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怎么能够以未做的或做得十分有限的考古工作,来否定楼兰就不是两汉时期的楼兰古城呢?事实上前人和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清理出土了不少两汉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如对LC和MA墓地的清理^{〔1〕}。只是在楼兰城中未见出土两汉时期的木简文书而已。笔者以为黄盛璋先生说得很对,他说“绿洲王国的特点: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小国,绿洲的中心就是国都所在,

〔1〕 侯灿:《楼兰城郊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7)。



如此,城与国一同名。尽管楼兰城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楼兰城出土怯卢文书自称其城为 Mahamtanatar(大都)、Kroraina(楼兰),Kronain 即楼兰,有人不承认此城为楼兰,有人虽承认此城为楼兰,但不承认其为国都,但此城既名楼兰,楼兰建国之初只能在此,并且国都楼兰与楼兰国的建立基本同一。楼兰城建立也就是楼兰国成立的标志。”又说:“都城之名,为国名,不仅新疆绿洲王国皆如此,中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常有此例,如韩自称郑,赵称邯郸可证。”^{〔1〕}

总之,笔者认为楼兰古城就是西汉元凤四年(前 77)前楼兰王国的都城,楼兰王国更名鄯善南迁后,楼兰都城是两汉王朝的屯戍重地,很可能是西汉王朝设置的乡级政权单位,至曹魏西晋时期,正如拙著《魏晋西域长史治楼兰实证》一文所述,从古城规模所在位置和古城出土木简纸文书证实,这里就是当时西城长史的治所和驻地。

【作者简介】侯灿,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域考古、敦煌吐鲁番学研究。

〔1〕 黄盛璋:《塔里木河下游聚落与楼兰古绿洲变迁研究》,《亚洲文明》第 2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